

当代中国建筑的基本状况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Basic Situ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ure

[郑时龄] Zheng Shiling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收稿日期

2014/01/22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影响下,中国大陆的城市问题和建设问题都十分错综复杂,需要分析其基本状况。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自1980年代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城和新区快速涌现,其规模甚至是原有城市的翻番。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重要的发展指标,中国城市化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建设量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被评价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1]。与此相应的是建筑数量的剧增和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一些大城市的建设用地占市域面积的比例已经在世界大城市中居于高位,相当一部分城市的粗放型建成区面积已经超过实际的需要。

在现代化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在进行重组。城市的战略发展研究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已经纳入城市的总体规划修编,成为城市发展的导向。城市规划先行的思想和政策已经成为共识,城市规划愈益成为公共政策,并成为城市发展的引导和城市管理的依据,而不只是城市发展的最终蓝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正日益具有挑战性,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正在调整,新型城镇化要求城市转型发展。城市的空间环境、生态安全和生活质量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获得更为深切的关注。

就当代中国大陆的建筑而言,建筑往往是政治地缘文化的阐释和直喻,建筑经常成为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有时又是忝列政绩的丰碑。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形成了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建筑最重要的因素。在媒体和网络的推动下,建筑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一些报刊不定期辟出专栏讨论建筑问题,建筑师也更为广泛地参与各种建筑展、艺术展、建筑评奖、研讨会、报告会等活动,这些事件也成为公众广泛参与的活动。中国建筑师开始全面融入世界建筑,各种国际建筑活动中也都有了中国建筑师的身影,中国建筑师正在世界建筑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的召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筹办期间,出现了一批优秀的

建筑,培养了大批中青年建筑师。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国际建筑师和规划师的积极参与,在中国的作品也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引进了多元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建筑的各种潮流和倾向。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建设领域,中国正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

中国建筑师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从事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和景观设计,大批年轻的建筑师也得到培养和锻炼的机会,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建筑。然而也不能不感叹,建筑师们也失去了许多本可以创造更好建筑的机会,许多商业化的国际建筑师也带来了他们不受文化约束,无视社会环境的建筑。一方面中国建筑师得到在全新的环境和建筑领域中表现他们才华的机遇,而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建筑师和学术机构正在丧失他们的实验性和先锋性,缺乏深层次的社会人文关怀,缺乏前瞻性的研究,缺乏那种不断探索创作具有批判性意义的建筑。总体而言,仍然缺乏大量的高素质建筑师,对建筑师的培养在人文教育方面还存在许多缺失。我们的人均建筑师数量是许多发达国家的1/10,甚至1/15,1/30。尽管今天全国在校学习建筑学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万人左右,也仍然只相当于意大利的在校学生人数。

在相当多的项目中,境外建筑师成为主角,中国建筑师甚至连参加设计竞赛的机会都被排除。境外建筑师的情况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优秀的建筑师,也有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是外国建筑师就受欢迎的情况,在许多城市已经有了不少进步,邀请优秀的国内建筑师参加设计,但是他们有时候不一定是合适的建筑师。每年举办的国际、国内设计竞赛数量之庞大绝对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相当一部分设计竞赛和方案征集反映出草率的计划,许多设计竞赛项目的任务书语焉不详,业主并没有弄明白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建筑,就举行方案征集,让参赛者感觉就像是赌博。评审时也往往不深究技术经济问题,节能和生态问题的考虑也只是一种形式。2008年我参加上海北外滩城市设计项目的评审,一位澳大利亚建筑师送错了文本,把他参加迪拜一

项总体规划的设计文本给了我,十分详尽,甚至达到城市设计的深度。第二天发现送错了,重新把文本送过来。两份文本相比,上海文本的粗糙是显而易见的,这位建筑师在上海的设计不能不说是敷衍。

从1980年以来的这个时代对于中国建筑而言,是建筑创作繁荣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好的与最坏的建筑和建筑现象共存的时代。既是一个建立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缺乏信仰和价值观扭曲的时代;既是一个创造新文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去文化的时代;既是一个多元建筑的时代,一个实验建筑的时代,也是一个建筑商业化的时代,一个追求数量和质量并行的时代。既有国际建筑的强烈影响,也有源自本土文化的演变;既有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轻视甚至破坏建筑文化遗产的倾向。

就总体而言,当代中国建筑大致表现出以下6种相互影响并相互渗透的倾向:1)新现代建筑;2)批判性地域建筑;3)建筑遗产保护;4)新形式主义建筑;5)反现代建筑;6)原功能主义建筑等。

新现代建筑是当代中国建筑的主流,尽管发展道路艰难曲折,直面的问题太多,中国现代建筑仍然在坚韧地发展,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影响,有时候也受到缺乏现代思想的社会的批判和抵制。1990年代以来的建筑主要表现在对明星建筑的仿效,注重功能,表现建筑和社会的现代性,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有人摇摆并犹豫于新现代和传统现代之间。但是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缺乏现代建筑理论的积淀和科学技术意识的支撑,对建筑的现代性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大部分中国建筑师所从事的只能是有限的现代建筑,如果说发展中国新现代建筑的使命已经实现还为时过早。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织与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空间和建筑的重要特征,寻求中国建筑文化的固有特性一直是中国建筑的重要倾向。在当代中国,对传统精神与理性的探求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方兴未艾,理性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以寻求现代化的中国建筑之路。仍然有一些建筑师在

不断探索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仍然在推进批判性地域主义,创造了一批优秀的建筑。

随着急风暴雨式建设的基本平息,一些城市和地区已经认识到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保护意识近十年来在不断增强。目前已经有一批建筑师正在从事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保护修缮了一批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甚至警惕的倾向,需要我们反对的倾向。今天被认为是创新的一些建筑,实质上只是追求新颖,超越现实的“完美”,表现吸引眼球的奇特效果,注重纪念性、标志性和广告性,以虚拟替代现实。相当一部分建筑已经异化成符号,甚至建筑技术也成为形式的附庸,高层建筑成为追求城市形象的手段,一些城市争相竞争比建筑的高度。这是一种新形式主义,追求宏大叙事,追求纪念性和标志性,追求感观的愉悦。1950年代以来,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就已经成为中国建筑理论和实践所关注的焦点,形式主义始终是政治斗争的对象。而到了1990年代,形式在城市空间与建筑中,却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形式追随利润”成为城市 and 建筑心照不宣的宣言,高层建筑和高密度的无序建设就是一种明证。相当一部分建筑师在设计时缺乏对理念的提炼,以形式的原型代替理念,寻找与所要设计的建筑完全不相干的理念,或者在方案成型后再凑理念。例如2012年在上海的世博会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时,有一位建筑师为了追求室内空间的丰富,提出的理念是“爆炸”。

反现代建筑是当代中国建筑的特殊现象,长期以来,以否定历史作为现代建筑发展的思想,其实质是反现代和反理性,在这种思想意识主导下,只能是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对历史往往采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幻想在没有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历史,这些也反映在快速出现的没有历史和文化根基的城市中。思想进步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在历史进步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

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修正过的,但是它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

反现代和反理性的建筑思潮在中国几乎从未绝迹,在一定程度上,建筑领域出现了一种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许多场合表现为超越技术经济现实的过度现代化,或者逆现代,甚至是封建迷信的建筑思潮。将钱权经济理解为市场经济,脱离实际,好大喜功,过度豪华和过度现代化的建筑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商业文化的流行,追求奢华和感官效果,追逐财富之风日盛。媚俗建筑盛极一时,诸如“欧陆风”建筑、山寨式仿制、超级具象建筑、艳俗建筑、迪斯尼化和舞台布景式的建筑等。有许多这类建筑实际上是由政府机构所倡导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许多城市的新景观,迄今依然方兴未艾,其本质是反现代和反理性。封建迷信也表现在某些建筑上,一些业主热衷于风水,甚至要求建筑师按照风水师的安排进行设计,在建筑上表现钱财欲,把自己的私宅建造得像帝王的宫殿。上海某业主试图在建筑上表现控制欲,在他投资建造的建筑顶部加上一顶“帽子”作为王后的王冠,把正在设计将要建造的建筑比作国王的王冠,而把城市的电视塔看成是国王的权杖。

应该告别脱离环境的英雄建筑的时代,回归建筑的本原。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建筑的功能应当成为建筑的主导因素。一座优秀的建筑与所处的城市空间有着共生的关系,不虚张声势,不肆张扬,不霸道,不摆出一副纪念碑式的架势去统率城市空间,不去破坏城市空间的和谐。优秀的建筑应当考虑使用者的需要,以城市的公众利益为追求的目标。然而也出现了一种原功能主义倾向,这可能是绝大部分大量性建筑,追求数量的建筑所采取的道路,保障性住房以及一大批低造价,缺乏良好规划的社区和住宅区建筑采用了这种方式。此外,

相当一部分住宅小区成为缺乏社区公共生活的自我封闭式庄园，与公共环境割裂。

中国的现代建筑是在十分复杂的时空压缩的环境下演变和发展的，一直处于现代与反现代的矛盾之中。中国建筑的现代性必然不同于欧洲或美国式的现代性，中国建筑的现代性也不是单纯靠移植外国或境外建筑师的设计能够实现的。境外建筑师的设计能带来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带来西方的现代建筑思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然而不能直接移植过来成为中国建筑。中国建筑需要实验，需要探索，需要思想，需要摒弃受污染的思维模式。

目前建筑师的社会生态环境令人堪忧，需要优化建筑的决策机制，使之科学化，改变那种以行政决策取代专业决策，以钱权话语取代建筑话语的现象。在建筑师与业主的关系成为雇佣关系的状况下，建筑师对他们所设计的建筑没有发言权，建筑师从建筑的中心地位被排斥到边缘，设计变成产值的追求，变成单纯的绘图工具，其后果必然是大量水平不高的建筑充斥城市的空间。有时候，行政条例以及规定对建筑设计的不合理干预和各种评审甚至会达到过分深入的细微末节，以致于从空间布局、立面处理、材料选择到室内设计，都要求建筑师满足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筑师也需要加强社会责任，不断学习，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维护公众和业主的利益，摒弃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

建筑不仅仅是建筑师的作品，而是整个社会的作品。优秀的建筑需要土壤培植，需要有让建筑师脱颖而出的环境，需要培育适合中国现代建筑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 [1] 李小军. 数读中国 60 年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52.
- [2]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14.

建筑实践与理论反思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riticism

[王骏阳] Wang Junyang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收稿日期

2014/01/23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建筑史学家约翰·萨默森 (John Summerson) 曾说：“建筑理论与建筑生产的实际关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确定的。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新思想在某一个时代出现，风靡一时，却被下一个时代肆意践踏，而直到第三个时代才在建筑设计中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建筑风格的变革也完全可能无需任何理论层面的姿态。还有谁比米开朗基罗对建筑产生的影响更大？然而他对建筑理论的贡献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必须牢记，理论是一种历史过程，它有自己的生命，存在于自己的文字之中，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完全从实践中概括而来的原理，也没有必然反映理论的实践。”

之所以要引述萨默森的这段话，是因为它阐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理论与实践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而言，这是为寻求这种对应关系的任何企图打的一个预防针。

然而，尽管这样的道理并不难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讨论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如此宽泛的层面上。无论何时，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任务，就是对理论进行总结、反思、提出问题、进行争论，并以此推动实践。在这些方面，近年来，中国当代建筑界同仁还是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工作的。比如，史建主持的“新观察”、《建筑师》杂志最近几年对中国当代建筑的持续关注和讨论、《Domus》国际中文版的相关报道、《时代建筑》杂志在当代中国建筑语境中展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等，这里列举的只是有限的案例，不能一一提及。另一方面，尽管存在这些关注和讨论，但是与当代中国巨大的建筑和城市建设数量相比，还是数量相当不足。当然，无论在哪个国家，理论反思通常都是由学院建筑师或少数实践建筑师进行的，大多数建筑师通常忙于生产而无力顾及。

因此，重要的也许不是数量，而是我们在有限的数量中讨论了什么问题。首先，我们很少讨论与社会政治相关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建筑和城市实践的条件和状况，其中也包括建筑师工作的条件和状况。不难理解，这种缺失与中国社会公共言论空间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在这方面，朱涛的工作是出类拔